

A^B
C
D
E
F
G

彝语 语境中的 英语 教学与实践

赵建萍 著

English

云南大学出版社

彝语语境中的英语教学与实践

赵建萍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彝语语境中的英语教学与实践/赵建萍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81112 - 294 - 7

I. 彝… II. 赵… III. ①彝语—语境特征—研究②英语—语言教学—教学研究 IV. H217.4 H3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1392 号

彝语语境中的英语教学与实践

赵建萍 著

策划编辑: 徐 曼

责任编辑: 叶枫红

封面设计: 薛 崢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益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59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294 - 7

定 价: 15.00 元

地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前 言

《彝语语境中的英语教学与实践》是作者在彝族地区多年英语教学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研究成果，是在楚雄地区认真贯彻教育部出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和《高职高专英语教育课程教学要求》的指导下，以创新教育教学模式体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教学特色，促进学生对学习策略的积极思考和民族文化素养的提升为目的，旨在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提高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彝族是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北部、东部、南部、西部、东南部和中部六个方言，二十六个土语。虽然彝语的研究在语音、语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词汇方面的研究相对较薄弱，而从彝语与英语的对比研究入手，针对彝语语境中的英语教学实践而进行的专项研究迄今为止仍是语言研究领域的新课题。本书以语言学理论为依据，以少数民族地区彝语语境中的英语教学实践为研究对象，集功能、结构、文化为一体，注重方法、习惯的介绍和培养，遵循语言规律，以英语教学活动为线索，从彝语、英语的对比研究入手，注重理论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强调在彝语语境中英语语言的“正向迁移”，使受彝族母语影响的英语学习者在学习目标语言的过程中，当已有的观念和知识可能造成语言上的错误和文化上的误解时，能有意识地将两种语言、两种文化进行对比，自觉地揭示隐伏在语言背后、易引起误会和冲突的文化因素，自觉地改变和调整思维模式，以母语为支撑，积极进行语言的正向迁移，更好地培养对英语语言的综

合运用能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楚雄师范学院领导和外语系主任刘开富老师的关怀、帮助和多方照顾，美籍专家 Scott Marrifield 帮助审阅书中英文部分，云大出版社徐曼、叶枫红老师拨冗审阅书稿，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2006 年 11 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彝 族	(1)
一、彝族的民族渊源	(1)
二、彝族的发展近况	(7)
三、彝族发展的历史特点	(8)
四、彝族的支系	(10)
第二章 彝 语	(15)
一、彝语的渊源	(15)
二、彝语的分支	(16)
三、彝语的特点	(18)
四、彝文及彝文文献	(19)
第三章 外语学习综述	(22)
一、语言的认知过程	(22)
二、语言的理解过程	(23)
三、外语的语言知识和言语技能	(25)
四、外语言语技能的内部关系	(28)
五、外语言语技能掌握的三个层级	(28)

第四章 彝族地区的英语教学	(33)
一、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沿革及现状	(33)
二、彝族地区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及特点	(37)
三、楚雄师院大学英语教学指导性文件	(39)
第五章 彝语、汉语、英语语音与彝族地区英语听、说 教学	(48)
一、语 音	(48)
二、彝语语音系统	(50)
三、彝语声调	(67)
四、彝语音变情况	(69)
五、英语和汉语语音系统知识	(71)
六、英语和汉语辅音系统的组成及对比	(76)
七、英语和汉语辅音特点的综合分析对比	(78)
八、汉语声调与英语语调	(80)
九、英语语调的语言功能	(86)
十、英语的音变情况	(90)
十一、彝族学生在英语语音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问卷)	(91)
十二、彝族地区英语正音问题	(95)
十三、彝族地区语音教学	(105)
十四、彝族地区大学英语口语教学	(107)
十五、彝族地区大学英语听力教学	(120)
第六章 彝语语法与彝族地区大学英语读、写教学	(137)
一、语 法	(137)
二、语法对比的重要意义	(137)

三、彝语思维	(138)
四、彝语的语法和句型	(139)
五、英语与汉语的语法对比	(147)
六、彝族英语学习者语法方面的问题分析	(163)
七、彝族地区的英语写作教学	(166)
八、彝语语境中的英语阅读教学	(176)

第一章 彝 族

一、彝族的民族渊源

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又重新结为永久性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89 页）民族的形成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联合或合并过程，而是由原始部落经过长期的分化、混杂和统一重新联合或合并起来的稳定的共同体。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彝族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与周围民族融合、分化、相互影响。在融合、分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彝族必然会形成一系列与周围其他民族部分相似的民族特征，彝族具有的这种复合型的民族特征使得关于彝族渊源的理论众多，诸如：“高加索人种”理论、“卢人”理论、“濮人”理论、“僚人”理论和“氐羌民族”理论等。在对大量的考古材料、少数民族文献和汉族文献进行研究和反复印证后，目前对于彝族的族源广为接受的理论是：彝族源自古羌人，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彝族先民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曾与周围的其他部落有过广泛的接触，在这些接触中，彝族先民群体在文化发展与政治整合的许多方面因受到了周围部落的影响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表现为其社会内部的发展与外在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和对矛盾广泛的适应性。作为分布广泛的农耕民族，这些作用和矛盾一般表现为民族间的同化与吸收。这是因为农耕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较为稳定，只有当外部的冲击过大时，才会引起社会内部矛盾的激

化,导致原来的社会结构及组织形式崩溃,旧的模式解体;在逐渐恢复社会的有序状态,消融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原来稳定的系统瓦解,新的整合方式产生。

滇西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公元前12世纪之前,昆明人开始由澜沧江河谷不断向外扩张(张增祺,1982),其中一部分逐步占领了澜沧江以东及金沙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这表现在昆明人的有肩石斧(肩部呈弧形,与百越的肩部呈直角的石斧有别)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青铜器与洱海地区的梯形石斧及其衍生的梯形铜斧的交融。昆明人在春秋末战国时又继续东移,与分布在弥渡、祥云、姚安等地的“大石墓”文化的民族产生接触。“大石墓文化”主要分布在雅鲁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一般认为为笮人、邛人。先秦时期,今四川的大部分为叟(蜀)人的分布地带,叟有“崙”,“苏”、“蜀”等写法,直到两汉时期,今川西南有越崙郡,越崙郡以崙水得名,有大量的叟人居住。邛人当为古代叟人的一部分。《史记·正义》引《谱记》云:“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崙处。”唐崙州在今四川西昌,姚州为今云南姚安。这是文献上的佐证,所以,《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其(邛都)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蝶榆,名为崙,昆明”。崙即叟也。1979年,姚安黄牛山发现“大石墓”,墓中有七具不同个体的骨架,随葬品中没有金属器,仅有四十余件陶器,说明其墓葬年代较早。大石墓上叠压着一批竖穴土坑墓,墓中出土的和昆明人相关的青铜器表明,当时的昆明人已经和以“大石墓”为特征的民族杂居在一起了。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东迁的昆明人经楚雄、元谋、牟定至禄丰一带,受到了滇王国的遏制。昆明人和滇人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就有不少反映双方作战的图像。其后,在西汉初、中期,部分昆明人通过武定、禄劝等地向北境的曲靖地区渗透,直到朱提郡、牂牁郡西部,后来发展为“昆明十四姓”。(陇贤君,1994)《华阳国志·

南中志》提到的“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正是这种融合的反映。由于昆明人与叟人的广泛杂居，加之彼此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经过汉、晋五百余年的分化和瓦解，二者又重新组合和融合。

羌，《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注：“御览引风俗通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从人，因以为号。”他们当时居住在我国西北高原上，和殷人、周人的关系比较密切。自战国以后，史书中记载羌人的活动多在河（黄河）、湟（湟水）、洮（洮河）、岷（岷江上游）一带。《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之，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文献中明确记载了羌人分布的南部接蜀汉徼外蛮夷。这个夷，即是古代的叟，亦即是古代彝族先民。《华阳国志·蜀志》说：“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汉武帝开西南夷，以笮都置沈黎郡。《后汉书·笮都夷传》说：“笮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笮都县……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又有记载：天汉四年“罢沈黎郡”，“并蜀郡西部”，又“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这些部落北起“汶山以西，南至越嶲郡”，共有“百余国，户百余万，口六百万以上”。另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引文颖曰：“笮者，今为定笮县，皆属越嶲郡也。”汉“定笮县”略当于今凉山彝族自治州之盐源、木里县；笮秦县则略当于今冕宁县西部及雅安地区九龙县一带，北接汉源县。《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笮都也。”《冉駹夷传》载：“武帝元鼎六年，开冉駹为汶山郡；宣帝地节三年，废郡并蜀郡为北部都尉。”《水经·江水注》载：

“汶山郡治汶江道（今茂汶羌族自治县），渡江有笮桥。”可见当时人们已知蜀郡北部也有笮人（陇贤君：1994）。

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谓首，灭狄源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后汉书·西羌传》）。羌人南迁入夷叟分布区域，必将影响到该地区的民族关系，羌人的南迁一方面给这个地区注入新的元素，另一方面也打破了该地区原来的平衡状态，人口数量的增加，生产资料的分配给环境带来了新的压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新移民的突然到来，使该地区生产物的人均量骤然下降，为了自己的利益，双方都得抑制或打击对方。事实上，从历史角度来看每一次移民都具有军事移民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寻找和占有一块新领地。据羌族史诗《羌戈大战》记载，他们原是游牧在草原之地，后被“魔兵”（即汉兵）驱赶，乃“集众西行”，到达“补尔山”（传说是四川、甘肃间的岷山）。又在魔兵追迫下，逾大雪山来到热兹（今松潘境）。在热兹居住一段时间后，再南迁到茂汶，率领羌人南迁的首领叫阿巴白构。他们与原先居住在茂汶地区的戈基人相遇，双方发生冲突。阿巴白构打败了戈基人，在日补则（今茂汶县境）上建立家园。阿巴白构有九个儿子，分驻九处大寨，分布在今茂汶、松潘、汶川、理县、黑水、灌县、北川等县境内，大致与今茂汶羌族的居住地域相近。（见《木姐珠与斗安珠》，四川民族出版社）

结合以上史料和有关的彝文、汉文文献，我们对彝族的发展史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关于古代彝族先民从猿进化为人类初期的起源阶段，彝族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彝语史诗《查姆》把他们的进化分为“独眼人”、“直眼人”“横眼人”三个阶段。彝

族进入人类社会之始处于原始的母系社会，如四川彝文典籍中记载，在雯治世烈以前，彝人有四个王朝，共三十三代，都是处于母系社会时期。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彝族先民进入了父系社会。从彝族父系谱系来看，彝族先民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时间至少应该是在西周末年的洪水时期以前。洪水时期乃彝文文献记载中的“笃慕”时期。彝族史诗《英雄支格阿龙》记载：支格阿龙曾征服了滇濮梭洛周围的部落，成了最高的主宰——噢姆（彝语，意即帝王）。梭洛两字按彝文文献中的原意指地名，是湖和海的意思，即滇濮地方的深湖或大海，很可能指的是现在昆明地区的滇池。在另一部彝文典籍《六祖魂光辉》中记载彝族的祖先远在“凡间人”时代就已住在“谷窝”（意即“螺壳城”，在今滇池北岸）。“谷窝人类母，来自得之家；谷窝凡间人，个个是金身；金身人那时，兽与人同居。”后来经历了“天地十二代，二十四代祖”的发展，进入了奴隶社会，产生了噢姆（帝王）这个阶级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当时的社会结构模式是“兹”（即君）、“莫”（即臣），“毕”（即祭师），“格”（即匠）。社会职能分工为：“君魂施号令，臣魂来指挥，师魂有见识，匠魂管艺人。”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在六祖分支之前，时间相当于周朝的前期。（陇贤君：1994）彝文文献中记载的父系氏族第一代人是“希慕遮”，而从“希慕遮”到“笃慕”，中间还有三十代人的时间间隔。“笃慕”生有六子，老大慕雅切（武部），老二慕雅考（乍部）、老三慕雅热（糯部）、老四慕雅卧（恒部）、老五慕克克（布部）、老六慕齐齐（默部），也就是六祖，六祖分支，形成了六大部落（黄建明，2006）。“笃慕”以前彝族先民多为聚居状况，“六祖”以后彝族先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统一体才开始分解。据彝文文献记载，彝族今天的格局是由“六祖分支”后的六个部落发展繁衍而成的。至春秋战国时期，彝族的先民已分布在今滇、川、黔地区，彼此经济、政治之间的联系逐渐加

强,部落间相互交流增加,有关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证明:其共同的文化特征是祀鬼、跣足等;共同的体质特征是高鼻、长身等。秦、汉时期,西南一带彝族先民的共性增加,在汉文文献中被称为“西南夷”。东汉后期,彝族先民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逐渐加强,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此自秦汉以来彝族中形成了一些颇具实力的地方权势集团,在汉文献中被称为“夷帅”。东汉后,“夷帅”为各自势力范围的扩大而互相争斗,在争斗过程中,部分“夷帅”从中崛起,成为一方的望族,其中,爨氏建立了威慑一方的政权。公元339年,爨氏在南中确立了统治地位,并于此后统治南中地区四百余年。爨氏统治地区分为东爨与西爨两部分,东爨地区约为今云南昭通、东川、寻甸以东,滇、黔、贵交界处,北抵四川凉山东部,南至红河州;西爨辖区大致相当于今云南曲靖、昆明以西,洱海以东,北抵金沙江,南到建水。(黄建明,2006)历史上又把这一时期的彝族分为“东爨乌蛮”、“西爨白蛮”,居住在东爨的是乌蛮,居住在西爨的是白蛮。“乌蛮”、“白蛮”是特定时期对特定地区少数民族的普通称谓。唐代是彝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唐初,洱海地区分布着六个地方政权,其中,蒙舍诏在其他五诏之南,在今天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境,故又称南诏。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南诏在唐的支持下,“合诏为一”,先统一了洱海地区,继而吞并了爨地,最后夺取姚州及其他三十二州,建立了“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佗;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黔巫”的政权。唐册封南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并支持皮逻阁统一了六诏,兼并了滇东的爨地,在中国西南建立了以彝族为主的南诏政权,成为西南地区一支强大的力量。南诏覆灭后,在原南诏领地上先后出现“大长和国”(公元902—927年)、“大天兴”(公元928年)及“大义宁”(公元929—937年)三个后南诏时代政权。因其内部纷争不休,公元

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乘机联络滇东、黔西以彝族先民为主的“乌蛮三十七部”彝族人民灭了“大义宁国”，在云南建立了号称“大理”的封建政权。“大理”公元937年建国，1253年为蒙古所灭，其辖境几乎包括今云南省的全部、四川西南部以及贵州西北部的一些地方，疆域相当广阔。宋代，除大理政权统治了主要的彝族先民部落外，还有一些彝族先民建立了较小的地方政权。如“罗殿国”、“罗氏鬼国”等。公元1253年，蒙古军队进攻云南，促使当时处于分裂状况的彝族地区出现了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盟，并开始统一于“罗罗”的族称之下。此外，蒙古政权在彝族地区采取了分封当地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元朝在原大理政权统治的基础上先设万户、千户、百户，后改设路、府、州、县，行省及路之间设宣慰司，为省级机构，管辖境内军政事务。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彝族地区施行的是改土归流政策。自此，彝族人民逐渐走入近、现代史。

二、彝族的发展近况

现代彝族，居住在中国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北纬22°—29°、东经98°—106°之间，人口6 578 524（1990年人口普查）。川、滇的大、小凉山为彝族大片聚居区，其余则小聚居大分散。自称有诺苏、纳苏、讷苏、撒尼、阿细、拉罗拔、尼苏、罗武、米撒泼等，1949年后统称为“彝族”。1949年12月10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彝族）宣布云南起义。1949至1950年，西南彝族地区全部获得了解放，彝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得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彝族地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彝族地区的农业、工业、交通、文教、卫生等事业都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显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关系，把民族团结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一系列改革中，都一直强调照顾少数民族人民

的特殊利益。20 世纪 50 年代政府开始在彝族地区成立彝族自治州和自治县，彝族自治地方行政长官多由彝族人担任。60 年代以后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生活情况、行政体制与我国其他民族的发展基本保持同步，都共同经历了经济困难时期、经济恢复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从 70 年代末开始，彝族人民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彝族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大部分彝族人民已解决了温饱问题，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广大彝族地区的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大为改善，教育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彝族学生的入学率、升学率都极大提高，涌现了大批的彝族专家、学者、企业家、艺术家。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彝族地区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地区，还需要广大彝族人民团结起来，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

三、彝族发展的历史特点

古代彝族先民和周围的其他民族广泛地杂居在一起，这种杂居的状况、程度，各部所处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中央王朝对各部的制约和影响力的不同，造成了彝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

(1) 融合的不彻底，造成各部之间的差异，形成了后来彝族众多的支系。彝族的先民自秦汉以来就和昆明等杂居在一起，经过汉、晋五百余年的分化和瓦解，统称为夷，但各部间融合程度有较大差异。《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水经·温水注》云：“温水又迳味县（今曲靖）……刘禅建兴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宁郡于此。水侧皆是高山，山水之间，悉是木耳夷居，语言不同，嗜欲亦异。”唐朝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东部乌蛮，北部乌

蛮、西部乌蛮的分化状况。各部有数十部落，各地称谓不同，用字不一，各部间虽有联系，文化有共性，族内语言有共同点，但仍存在着许多差异，且各部发展不平衡，于是逐渐发展成为以后的支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进行了族别的调查工作，经过复查修正，彝族支系计有二三十种。方言有北部方言，东部方言、中部方言之分，方言之下又有土语。

(2) 彝族的发展史上有分有合。唐初，滇西的昆明与叟各部融合为“六诏并乌蛮”，出现了以蒙舍诏为首的六诏。原来“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昆明，由于各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到7世纪，即唐初，已发展成“人多殷实，多于蜀川”，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两三百户，“无大君长”，“名擅一州”的农业部落。（《唐会要》卷98）后来，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合诏为一”。南诏的建立，使得云南地区的彝族被置于统一的政权之下，有了统一的政治、经济生活。由于是本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无论在政权的设置或是处理、调节与其他民族关系的能力上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这对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的整合与确立都有极大的影响。

(3) 各部内也存在较多差异。如北部乌蛮就比较特殊。南诏建立之初，并未包括今川西南和滇东北相连接的大、小凉山以及以勿邓为代表的北部乌蛮。其情况据《新唐书·南蛮传》说：“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裹五姓，皆乌蛮也，居邛部，台登之间。……又有东钦蛮二姓，皆白蛮，居北谷……又有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又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诸二姓隶焉。”显然，北部乌蛮各部落内部的血缘关系很浓厚，按此划分为多少不等的氏族，部落界限分明，内部分化缓慢。直到宋朝时期，依然如此。《宋史·黎州诸蛮传》说：“唐